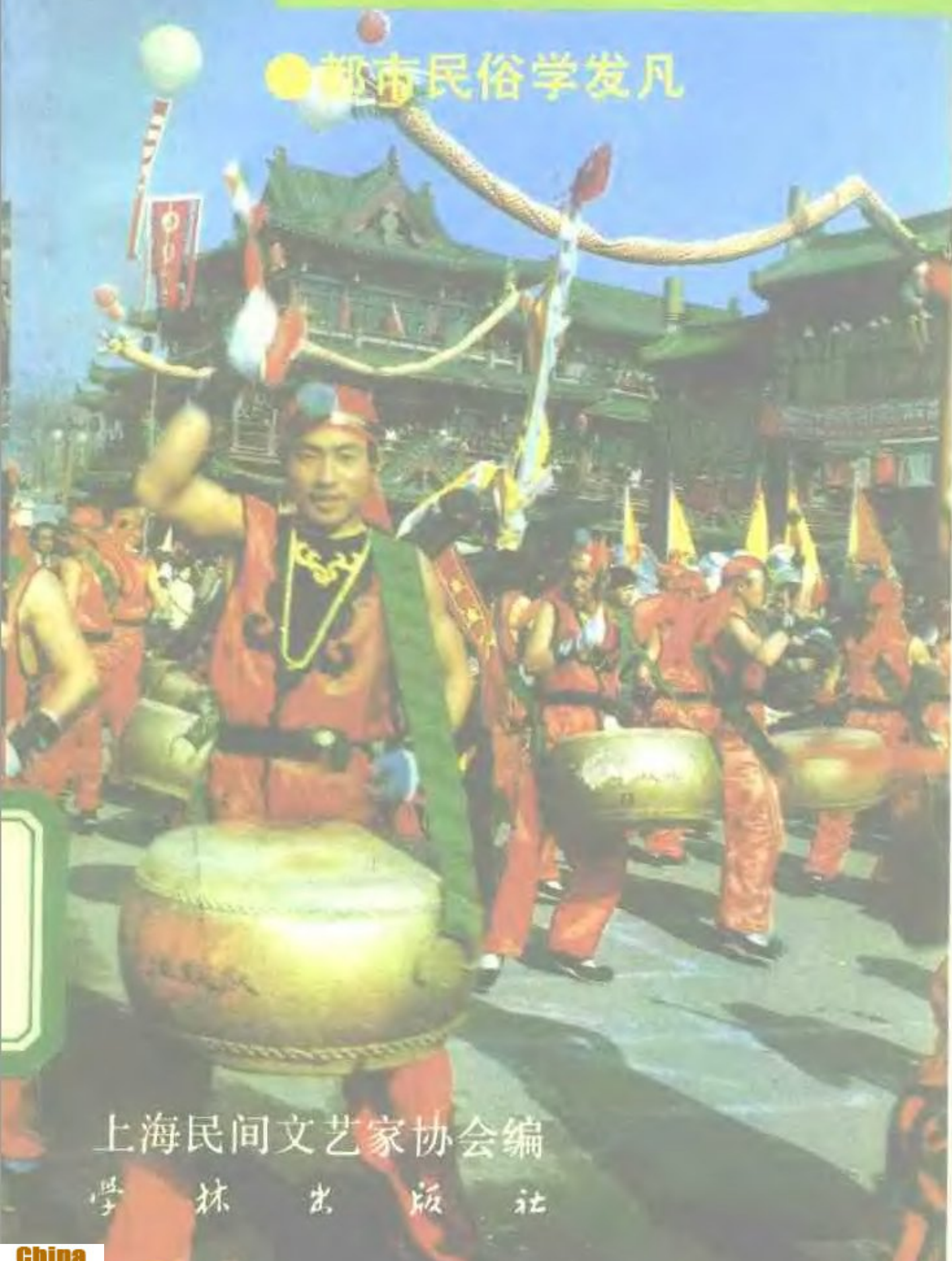


第八集

中国民间文化

● 都市民俗学发凡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学林出版社

CHINA
FOLK CULTURE
URBAN FOLK CULTURE
GENERAL INTRODUCTION

03.28

K293.24

115



200249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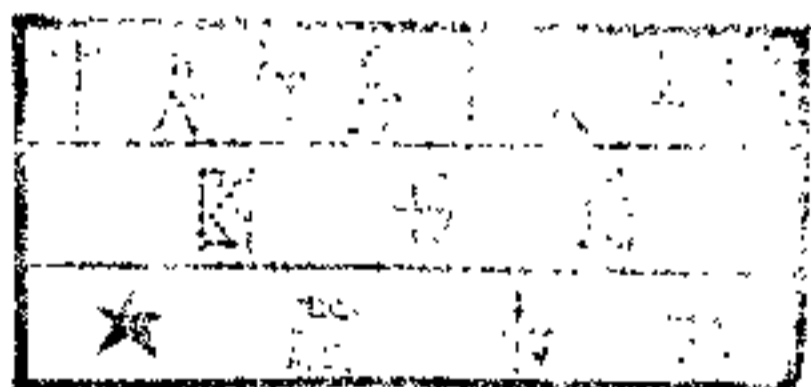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化

——都市民俗学发凡

4

1992

(总第八集)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 郑土有
封面设计 俞子龙

中国民间文化(第八集)

——都市民俗学发凡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7—80510—725—4/I·255

定价：4.20元

目 录

都市民俗研究发凡

- 西安民俗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甄 亮(1)
- 转型期的汉口民俗
- 清末民初汉口民俗特征探论……………萧 放(14)
- 从热都武汉看自然气候对民俗的影响……彭 德(22)
- 湖海客来谈贸易，缙绅人士话唐虞
- 论成都茶馆的特点及功能……………刘黎明(32)
- 融中西于一炉，集食艺于一堂
- 广州茶楼文化研究……………叶春生(40)
- 旧上海饮食业的风俗……………周三金(53)
- 浅析协大祥绸布商店的《店员规例》……………顾忠慈(67)
- 论明清山西商业民俗对我国城市
- 兴起的作用……………段友文(83)
- 都市民俗研究与商品经济开发……………莫 高(91)
- 长春市广场秧歌调查……………金宝忱(100)
- 新故事改革遐想……………任嘉禾(108)
- 大都市中的民间文学
- 对上海市卢湾区民间文学普查情况的思考
- ……………俞成伟(115)

DJ47106

英美城市民俗学的兴起及其对民俗

学的理论意义……………高丙中(123)

民间文化理论研究

《到民间去》序……………钟敬文(133)

论民间文化的相对性特征……………程 蔷(144)

民间文化与通俗文学……………罗永麟(162)

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层意识

——兼谈俗与雅思想文化辨析……………蔡铁民(179)

论民俗文化的调适机制……………秦家华(189)

民间文化调查

民间信仰中关羽的祭祀与中国戏曲……………李 平(198)

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其信奉活动

……………吴刚毅(214)

太仓县七夕“乞巧会”调查……………陈有觉(219)

安吉县山河乡的山神和鸡的信仰……………方 向(234)

书 评

《中国丧葬礼俗》述评……………吴汝祚(244)

来自田野的报告

——评《东南蚕桑文化》……………洪 荒(247)

《中国民间文化》第一至八集总目录……………(249)

西安民俗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

甄 亮

一 西安民俗发展的几个历史时期

西安处于渭、泾、沣、洛等“八水绕长安”的冲击平原地带，居于关中盆地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古称“膏腴天府”、“陆海丰饶”。

西安，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西安市郊的“蓝田猿人”距今一百万年，是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多年，都说明西安附近的渭河两岸早就繁衍生息着原始先民。约公元前2200年，周人部族活动于关中西部，公元前1134年，周文王自岐山迁都于沣河西岸建丰京（今西安西郊），周武王继位后又在沣河东岸建镐京，西安建都历史从此开始。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建都咸阳（今西安北郊）。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长安城（今西安西北）为京都，以后的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都以长安为京城。唐长安城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是当时前后修起面积十一点九九平方公里的君士坦丁堡（今意大利首府罗马）的七倍、面积十三点六八平方公里的巴格达（今伊拉克首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新实行“制礼作乐”制度。武帝设“乐府”，“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就是“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三纲”、“五常”、“礼仪廉耻孝悌信”的封建观念渗透在民俗活动中。如表现在男女关系上，不能像秦代那样不拘礼，男女有别，“翁妇非礼不见面，伯氏于弟妇，虽礼问不通”（《咸宁县志》）。汉武帝采用“太初历”纪年法，规定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月，将周秦时尚未明确定时的春节定型化了。汉代中后期，统治者下令每年正月十五，士族庶民一律挂红灯，无论城乡具要昼夜通明。这个习俗经官方倡导流行至今。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都定型于汉代。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长安成了全国财富集结地，就连卖丹药、卖豆豉的人也成了资产巨万的豪富。“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成功促进了长安商俗的发展。汉武帝时创立了国立太学，并规定太学士要“服方领，曳长裙，习矩步”，以培养“每以礼相厌，不以辞长胜人”的儒家风范。从此又奠定了文士礼俗。后代的知识分子相染成习，人们只从服装、言谈举止便可辨明身份，可谓影响深远。

3. 魏晋南北朝、隋唐融合期。东汉末年，我国北方地区出现纷争战乱局面，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北疆草原文化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农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了。氐族人苻坚掌握前秦政权后，曾有组织地迁移数万户鲜卑、羌等族人定居长安，人数占总人口一半多，今天西安不少市民就是胡姓后裔。“四夷宾服，湊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长安城再次出现民族民俗融合。突出显示在服饰、食俗和节日习俗上。长安居民不仅穿着传统的长袍、长裙服饰，而且穿上短而巧便于生活起居和骑马征战的“胡服”；饮食上不仅有以麦黍为主的面食，还增添了胡人畜奶制品和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就连南方的稻米食品也进了长安居民家。甚至逢年过节，在祭拜祖先的供桌上也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新实行“制礼作乐”制度。武帝设“乐府”，“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就是“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三纲”、“五常”、“礼仪廉耻孝悌信”的封建观念渗透在民俗活动中。如表现在男女关系上，不能像秦代那样不拘礼，男女有别，“翁妇非礼不见面，伯氏于弟妇，虽礼问不通”（《咸宁县志》）。汉武帝采用“太初历”纪年法，规定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月，将周秦时尚未明确定时的春节定型化了。汉代中后期，统治者下令每年正月十五，士族庶民一律挂红灯，无论城乡具要昼夜通明。这个习俗经官方倡导流行至今。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都定型于汉代。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长安成了全国财富集结地，就连卖丹药、卖豆豉的人也成了资产巨万的豪富。“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成功促进了长安商俗的发展。汉武帝时创立了国立太学，并规定太学士要“服方领，曳长裙，习矩步”，以培养“每以礼相厌，不以辞长胜人”的儒家风范。从此又奠定了文士礼俗。后代的知识分子相染成习，人们只从服装、言谈举止便可辨明身份，可谓影响深远。

3. 魏晋南北朝、隋唐融合期。东汉末年，我国北方地区出现纷争战乱局面，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北疆草原文化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农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了。氐族人苻坚掌握前秦政权后，曾有组织地迁移数万户鲜卑、羌等族人定居长安，人数占总人口一半多，今天西安不少市民就是胡姓后裔。“四夷宾服，湊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长安城再次出现民族民俗融合。突出显示在服饰、食俗和节日习俗上。长安居民不仅穿着传统的长袍、长裙服饰，而且穿上短而巧便于生活起居和骑马征战的“胡服”；饮食上不仅有以麦黍为主的面食，还增添了胡人畜奶制品和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就连南方的稻米食品也进了长安居民家。甚至逢年过节，在祭拜祖先的供桌上也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新实行“制礼作乐”制度。武帝设“乐府”，“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就是“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三纲”、“五常”、“礼仪廉耻孝悌信”的封建观念渗透在民俗活动中。如表现在男女关系上，不能像秦代那样不拘礼，男女有别，“翁妇非礼不见面，伯氏于弟妇，虽礼问不通”（《咸宁县志》）。汉武帝采用“太初历”纪年法，规定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月，将周秦时尚未明确定时的春节定型化了。汉代中后期，统治者下令每年正月十五，士族庶民一律挂红灯，无论城乡具要昼夜通明。这个习俗经官方倡导流行至今。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都定型于汉代。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长安成了全国财富集结地，就连卖丹药、卖豆豉的人也成了资产巨万的豪富。“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成功促进了长安商俗的发展。汉武帝时创立了国立太学，并规定太学士要“服方领，曳长裙，习矩步”，以培养“每以礼相厌，不以辞长胜人”的儒家风范。从此又奠定了文士礼俗。后代的知识分子相染成习，人们只从服装、言谈举止便可辨明身份，可谓影响深远。

3. 魏晋南北朝、隋唐融合期。东汉末年，我国北方地区出现纷争战乱局面，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北疆草原文化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农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了。氐族人苻坚掌握前秦政权后，曾有组织地迁移数万户鲜卑、羌等族人定居长安，人数占总人口一半多，今天西安不少市民就是胡姓后裔。“四夷宾服，湊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长安城再次出现民族民俗融合。突出显示在服饰、食俗和节日习俗上。长安居民不仅穿着传统的长袍、长裙服饰，而且穿上短而巧便于生活起居和骑马征战的“胡服”；饮食上不仅有以麦黍为主的面食，还增添了胡人畜奶制品和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就连南方的稻米食品也进了长安居民家。甚至逢年过节，在祭拜祖先的供桌上也

技艺发展，被誉为“长安第一味”的葫芦鸡以及葫芦头、饺子宴、牛羊肉泡馍、奶汤锅子鱼、菊花锅酿金钱发菜、黄桂稠酒等唐代风味名菜、名酒随之产生。唐长安人还一改秦汉时吃狗肉的习惯，“狗肉不上席面”的传俗至今。

唐代经济、文化的发达，丰富了节俗内容。除夕之夜，长安人到街头或寺院门口观看民间杂技、傩戏等艺术表演。元旦之日家家换上新桃符（贴钟馗像）。正月十五元宵节放灯三日，万人空巷。公元713年元宵节，唐玄宗命宫女数千人在“作灯轮高二十丈，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中“踏歌三日夜”。每到寒食节过后，皇帝在日暮时，要将钻取的新火种赐给百官，百官把传火的柳条插于门前，以炫耀皇帝的恩宠。长安百姓也争相仿效，清明插柳于门前便相沿成习。唐玄宗曾下令将清明扫墓祭祖之俗“编入王礼，永为常式”。清明节长安城里还举行打马球、荡秋千、蹴鞠、拔河等体育娱乐活动。端午节，各家各户门上悬挂艾叶，以驱邪除疾，宫廷里进行龙舟竞渡和游泳活动。八月十五中秋节，合家团圆，月下吃月饼赏月。重阳节，出门登高、赏菊、插戴茱萸，饮菊花酒。（《唐代长安的节日风俗》常凌文）唐代奉行开放政策，不太拘礼，对妇女约束较轻，在婚俗上，贞节观念较淡漠，离婚再嫁较自由。清明节，长安妇女结伴踏青春游郊外，“遇名花，则必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开元天宝遗事》）

唐代长安民俗显然比前代有不同特征：一是开放带来繁荣和民族大融合，民俗活动内容更为充实，如五花八门的商业行规和服食习俗；二是科技生产水平的提高，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盲目的自然崇拜和神怪观念，使民俗活动趋向礼仪应酬性和娱乐性；三是受科举制度影响，产生了唐长安的文士习俗。

4. 宋元明清近代期。此时西安，虽失去京都地位，但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仍被历代统治者所注重。北方的契丹、蒙古、女真人占据中原，先后统治全国，西安又经历了一次民族、民俗融

合。宋代，普遍使用火药，西安人在春节兴起燃放鞭炮、花火的习俗。元宵节，除了挂红灯，还举行猜灯谜及跑竹马、旱船、舞龙灯、踩高跷等民间社火娱乐活动。宋时西安人已将传统贴门神变化为贴春联。春节给孩童发“压岁钱”、“压岁果”的习俗从此兴起。元宵节，西安城有专门销售各种花灯的“灯市”，于是有娘舅给外甥送灯之俗。宋代建在西安东关长乐坊的道教八仙庵，每逢农历四月十四至十六日，庵内外人山人海，俗称过庙会。西大街北巷里的清真寺院，每到伊斯兰教的圣纪、尔德、古尔邦节，四面八方教民会集寺院，形成“回教”之俗。到了清代，西安城东北为满族居住区，满俗给西安人影响深刻，男人留长辫、女人穿旗袍最为突出。清代西安商贸兴旺，城内南院门一带居民稠密、会馆云集，诸如山西会馆、中州会馆、湖广会馆、福建会馆……数十家，从那各具特色的房屋建格风格上，可见得不同地域的风习。由于商人之间竞争激烈，就有了约定俗成的行规。如规定买卖双方正在言价儿，决不准第三者插手。交易时需用暗语论价，即一曰么、二曰按、三曰捎、四曰素、五曰歪……；大宗货物交易，都在袖筒里用捏指头的暗码讨价还价等。

清代西安城内有不少文化教育设施，像供陕、甘两省乡试举人用的贡院和西安学府、长安学府等，另有一些私人办的书院，如关中书院等。吸引大批读书人居住西安求学进仕，发展了教规礼俗。

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居民受进步思想影响，逐渐改变了闭塞落后的社会风气。当时西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戏剧艺术团体(秦腔)“易俗社”，鲁迅先生前来教学，特为俗社题写“古调重弹”。民俗专家李敷仁先生主编《老百姓报》《民众导报》，旗帜鲜明地宣传移风易俗。一时西安街头出现了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进行封建迷信活动的演讲和宣传品。尤其是1925年成立的西安工人总工会，表明工人阶级已登上政治

舞台，这对西安民俗的形成发展有重要意义。1935年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促使近代工业萌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一批工厂企业内迁西安，西安居民结构发生了历史变化。

5. 建国至今取舍更新期。1949年5月20日，西安市宣告解放，从此西安这个历史古都走向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西安民俗的发展亦经历了取舍更新的过程。其情形同其他城市大致相同。

二 西安民俗的形成特点

古都西安留给后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方方正正似棋盘样的古城墙，它既给人以安全感，又给人以古板封闭的印象。西安位居西北内陆，自宋以来一直处于闭塞状态。西安工业起步很晚，且是战争产生的畸生儿，缺少工业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冲击。西安当地人出身农民世家居多，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影响较深，历史形成了老成持重、敦厚内向和知足常乐、固步自封的秦人气质。可以说西安民俗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保留着北方农业文化的特征：重礼义，轻功利，恪守正统观念，轻视经世致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安城门洞开，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观念逐步更新，西安民俗在变革中发展。总结起来有四个特点：

第一，正统观念较强。西安，长期以来为帝王都，因袭守成、循规蹈矩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市民。西安人以雄厚的文化氛围自信，以正统的“陕西老大哥”自豪，对外来风俗习惯常常表现出兼容并收又“以我为主”的态度。八十年代初，迪斯科舞刚兴起于西安，除部分青年人热衷外，大多数人抱以轻蔑态度，以后，人们认识到这种舞蹈的娱乐作用就大方地接受了。他们接受这些外来风习是从“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出发点的。相反那些不符合国情（正统观念）的外域风习，如在公开场合拥抱接吻，跳“贴面舞”等时至今日，西安人仍怀有抵触厌恶心理。近几年在一些青年学

生中兴起过圣诞节，但影响甚微，远不如上海那么热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安人的正统观念不容。在人与人之间的称谓上，虽说“先生”、“小姐”满天飞，“师傅”通用，但西安绝大多数人仍认为称“同志”亲切，称年长者“大叔”、“大娘”（西安市民中河南人不少，故称）比较随和有感情色彩。生人问路用传统称谓比称“先生”、“小姐”更能受到热情礼遇。

西安民俗的正统观念反映在商业习俗上，就是“以诚待人，信誉第一，童叟无欺”。现今在西安的六十多万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来自江浙一带的生意人，他们认为：西安人较敦厚，生意好做。同时，西安人在封建正统思想影响下就业意识落后，许多青年人宁可待业也不愿去干那些诸如修鞋、跑单帮之类的沿街叫卖小生意，这就给较为重功利、商品意识较浓烈的南方人提供了发财机会。

西安民俗的正统观念在人生礼俗上表现最为突出。如春节走亲串友，别人送礼，应当还礼，礼品价值至少要相当，否则就“没礼”，或缺乏教养。在婚俗中，即是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在婚宴上必须请男女双方父母到场作为证婚人，若父母不同意亲事，做子女的也得千方百计请父母给个“面子”，不然人们会视婚礼不“正统”。新娘礼服还是忌讳白色的，甚至连乘坐轿车也要选红色轿车，以图吉祥。西安人重视过生日、祝寿，逢到年龄“关口”、“门坎”还要腰拴“红裤带”。西安市民除了每年清明节祭拜祖先外，农历十月初一夜深入静时，家人要到街道十字路口给亡故的亲人烧纸，俗称送冬或送棉衣。不难看出，西安人虽有大开古城门“走出古堡”的愿望，但在接受新事物、新习俗方面没有沿海城市人们那么快，原因是西安人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较深。

第二，融合性。西安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劫难，人口迁徙、民族融合，人口时增时减。清末西安城内人口仅十一万，建国前夕，西安城区人口为三十九点六万，其中半数以上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华中、华东沦陷区内迁西安的工厂企业人员及家属和河南等地难

民。现今西安城区人口达二百七十万，若再加六十多万流动人口，可谓人口密集，成分复杂。这三百三十多万西安人口中，将近64%是这些年来陆续招工、顶班进城的农民工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农民，其中不少人是家属在农村的“一头沉”职工。他们人虽进了城，但仍未摆脱农村的习俗观念。从这个角度讲，西安民俗体现了城乡交融的结果。实际上，由于历史战乱的摧残，地地道道的西安当地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现在不少西安人原是“胡人”后裔，历史发展将他们完全同化，可说是“准西安人”。再加上大量的随厂矿企业内迁的华东、江浙人和逃难到西安的河南人，以及历史久远的西安回民，共同完成了西安民俗的融合任务。

西安城内的民俗圈是很分明的：城北地区紧靠陇海铁路，当年河南人逃荒到西安，便在铁路两边择地搭庵棚栖居、或用破砖瓦垒成简陋低屋，大都靠出卖苦力或摆小商摊、茶水摊维持生计，实际上河南人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开拓者。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部分河南人从低矮黑暗的旧庵房搬进单元楼房，散居西安城区，但乡土味浓烈的河南方言和约定俗成的河南生活习惯仍维系着“内部交流”，至今，“河南话”与带有长安味、属关中语系的“西安话”成为西安通行的两大“官话”。据说，在西安会说河南话办事容易，甚至会说河南话乘火车也方便，因为西安铁路系统河南人居多，可见河南人在西安民俗中的地位。西安火车站以南的解放路地段一直是“河南人商业区”，现在还保存着“豫兴”、“豫民”、“中州”等带有明显河南特征的商店、旅馆、餐厅；这一带有一条饮食街，全是糊辣汤、丸子汤、油茶、大饼等带有河南食俗的传统小吃。西安西大街至西城墙的大街小巷聚居着回族同胞。这些回民的由来可上溯到唐宋时代（属地道的西安人）。这一地区清真寺云集，教习严明。清真小吃为西安食俗一绝，腊羊肉和牛羊肉泡馍为西安独有，传说慈禧太后避难西安，曾品尝老童家腊羊肉，赞不绝口，定为“贡品”。还有牛羊肉馅饼、柿子饼、粉蒸羊肉、

肉丸糊辣汤、烤羊肉串……均是西安回民名优小吃。在西安城西主要聚集着随工厂内迁西安的上海、江浙人，他们喜食大米与惯吃面食的西安人形成鲜明对照。城东南还集聚着东北人，他们亦是随企业内迁西安的，他们在生活起居上仍保留着东北习俗。

关中农民习俗、河南习俗、回民习俗、江浙南方习俗和东北习俗，在历史民族、民俗融合的基础上，再次达到新的融合，这就是西安民俗的现状。确切地讲，西安民俗是中外交融（主要指汉唐时代）、城乡交融、南北交融下形成的。西安人称：城东纺织城（云集国棉纺织厂），城西电工城（以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为主体的工业区），城南文化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林立），城北“贫民区”（旧指逃难的河南人），并评价说：城北河南人能吃苦，城西南方人灵性，城南文化人雅观，城东华东人豪爽，城中西安人敦厚。实际上西安民俗融合了这些民俗特质，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秦人风习。如表现在食俗上，牛羊肉泡馍、糊辣汤原是西安回民和河南人的“专利”，现已是西安市民共同喜好的传统小吃；米饭、面食，成为无论南方人、关中人均能接受的“主食”。在婚俗上，过去男女择偶不出“老乡圈”，现在西安青年找对象有意识“南北结缘”、当地人与外地人成亲，图的是“优生优育”、“福荫后代”。不少青年人一改传统婚俗，举行结婚舞会，拍摄婚礼录像等，体现了中外融合。这种融合性表现在语言交流上最为明显，现在西安城区除关中方言、河南方言、上海方言、东北方言外，还由于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混杂着川话、广东话、闽浙话等，人际交流的客观需要，逐渐形成了以关中方言为基础，容京腔、河南腔和南方韵味为一体的“西安普通话”。

第三，时代性。据统计资料表明，西安人现时的年龄构成属于年轻型（年龄的中位数为30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城区总人口的50%，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口占城区总人口的60%，其中大部分从业人员生长在新中国。相对来讲，他们受传

统观念影响较少，比较容易接受先进文化，他们是西安民俗更新发展的主力军，但同时也有盲目接受外来风习、丢掉好的民俗传统的倾向。新俗的产生往往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俗的产生也是时代的要求。西安人过春节送礼，已从过去的烟酒食品发展为赠送带有纪念性的高档消费实物和艺术装饰品，亲朋之间往来贺喜或祝寿，相送精装书籍或书画作品。特别是青少年，每逢过生日、升学，互赠精美礼卡已成时尚。青年人结婚讲究排场，大屏幕遥控彩电、录像机和组合家具等高档消费品应有尽有；乘轿车已不满足“皇冠”，而非“奥迪”不可，否则“掉价”。

改革开放增强了西安人的时代观念和息意识，一些不合时代节奏、不利经济建设的古俗在有意无意中被更新了。如传统的家务劳动正在向社会化发展；出现洗涤经营部、搬家公司等；饮食结构、就餐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开始注重营养价值和省时省力的快餐；在商俗中传统的“无奸不商”的落后观念正在被打破，倡行公平交易“无商不福”的新习逐渐形成。过去，西安人见面就问“你吃了没？”如今，见面就打听有什么生意可做。西安既是开放城市，又是世界旅游热点，对外贸易逐步扩大，西安人不仅要懂得对内搞活，而且需要学会同外国商人打交道，所以学外语、学经营管理成为西安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热门，电话、步话机等现代化通讯设备进入了成千上万个“寻常百姓家”。

第四，文化娱乐性。西安民俗发展到现今，其文化娱乐性特点更为显著。十多年改革开放成果给西安人带来实惠，吃喝不发愁，生活向更富裕的小康水平发展，这样，玩乐就成了西安民俗活动的“主角”。春节期间观花灯、看社火表演，清明节春游，重阳节登高，给人们提供了一次次游玩娱乐的机会。每到夜幕降临，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或到城墙下听“秦腔”、看“豫剧”，或到夜市上观“景”、品小吃，或进入舞厅翩翩起舞，或汇入气功队列练它几招……尤其到酷暑夏季，人们下班以后纷纷来到古城墙上下或观赏

或参与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已成新俗。

从以上西安民俗的历史发展和形成特点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认识：西安民俗是以周秦民俗为基础、融汇华夏各民族民俗、中外相合、城乡交融、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相冲突而形成的一种民俗。由于西安地处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黄金时期都城的所在地，因而西安民俗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全国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安传统民俗更多地反映出华夏传统民俗的特征。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深受封建正统观念和宗法思想的影响，使西安民俗具有正统观念较强的特点，西安民俗的历史发展又呈现了融合性、时代性和文化娱乐性的特点。

西安民俗属内陆封闭式古都型城市民俗，其重继承、轻批判，重礼义、轻功利的特性为同类型城市所共有，因此，研究探讨西安民俗的形成发展，是有代表意义的。